

## \* 研究動態 \*

# 竟陵派的詩經學

## ——以鍾惺的評價為中心

村山吉廣\*著 林慶彰\*\*譯

### 明代的說詩

明代說《詩》分為四派。其一，沿襲元代，墨守朱《傳》。典型的著作是胡廣等奉敕撰的《詩經大全》。這書是明永樂年間修纂的《五經大全》之一。《四庫全書》的《提要》對這書有如下的描述：

其與纂修者，自胡廣以下，如：楊榮、金幼孜等凡四十二人，悉一時知名之士。然其書實本元安成劉瑾所著《詩傳通釋》而稍損益之。今劉氏之本尚存。取以參校，大約取其冗蔓者，略刪數條。又劉本以《小序》隸各篇之下，是書別為一編，小變其例而大指則全相蹈襲（下略）。（譯者注：此係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的書前《提要》）

這書依照劉瑾的《詩傳通釋》，而將《小序》別為一編。《總目提要》嚴厲的批判該書「乃剽竊舊文，以應詔。此書名為官撰，實本元安成劉瑾所著《詩傳通釋》而損益之」。但這書頒布學宮，「學舉業者，必以此為準則」（《提要》語），因此有很大的影響。

其二，不偏於朱《傳》，漢、宋兼採，博考名物。例如：季本的《詩說解頤》可

---

\* 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，日本《詩經》學會會長，《詩經研究》主編。

\*\* 本處研究員。

舉爲一例。這書《總目提要》有相當好的評價。該書所述如次：

是書凡總論二卷、正釋三十卷、字義八卷。大抵多出新意，不肯剽襲前人，而徵引該洽，亦頗足以自申其說。凡書中改定舊說者，必反覆援據，明著其所以然。如以《南山》篇之「必告父母」句，爲魯桓告父母之廟，《九罭》篇之「公歸不復」句，謂以鴻北向則不復爲興……（中略）……如斯之類，皆足於舊說之外，備說《詩》之一解。雖間傷穿鑿而語率有徵，尚非王學末流，以狂禪解經者比也。

季本《詩說解頤》撰作的動機，在〈序〉中所引張橫渠的話，有如下的敘述：

張子曰：置心平易，然後可以言《詩》。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其解頤矣。此說《詩》者以意逆志之宗旨，而《詩》傳之所以可續也。（下略）

關於《詩序》曾給予「謂學《詩》而不求《序》，猶入室而不由戶也」的評價（譯者注：此爲季本評前人對《詩序》的看法，原作者誤爲季本的觀點。）；關於朱子，也有「爲《辨說》一洗《序》說之陋，而又爲《集傳》以詳解之。可謂有功於《詩》學矣」，來肯定他們的意義。但也指出朱氏書「特其所見，猶泥舊聞而《詩》之大意不能超然悉會於言表，則反有以起人復尋毛舊」的局限。季氏的主張，在「首篇」的末尾「蓋於舊說多所破之而一以經文爲主」，已作了很詳盡的說明。

對於季本這樣的立場，朱竹垞的《經義考》也說：「徐渭曰：會稽季先生所著《詩說解頤》，其志正、其見遠。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，深有得於孔氏之遺旨，有裨後學。」可說給予很高的評價。季本，字明德，號彭山。師事王陽明。但他的學問並沒有遠離實證，《總目提要》在該書提要之末有如下的話：

尚非王學末流，以狂禪解經者比也。存此一編，使知姚江立教之初，其高足弟子，研求經傳，考究訓詁，乃如此。亦何嘗執六經注我之說，不立語言文字哉。

和《詩說解頤》有同樣立場的同時代著作，有郝敬的《毛詩原解》、李先芳的《讀詩

私記》、朱謀埠的《詩故》、姚舜牧的《詩經疑問》<sup>①</sup>等。這些書，有時毛《傳》、朱《傳》兼用，有時主毛、鄭，而批判朱子。折衷和批判的根據，大部分是呂氏的《家塾讀詩記》、蘇轍的《詩集傳》、嚴粲的《詩緝》等。

其三，大膽主張自己的說法，以獨特的見解向世人宣示。最顯著的是何楷的《詩經世本古義》。這書特別強調論定詩篇的時世，各篇詩，從夏的少康到周的敬王，分三代二十八王的時代加以說明。他不理會以前詩篇的排列，將詩篇按世次來分類。

在他的〈自序〉裏，有如下的話：

書成悉依時代為次，名曰《世本古義》。仲子與氏誦《詩》論世之指也。卷凡二十八，與經宿配。每篇倣古〈序〉體，更定小引，以冠其前。其諸義未安者，則附見之章句之後，欲使觀者了其顛末，有所考鏡焉。

關於編次改變和《詩序》製作二事，論難很多。《總目提要》強烈的批判說：「楷乃於三千年後，鉤棘字句，牽合史傳，以定其名姓時代。如：《月出》篇有『舒窈窕兮』、『舒懷受兮』之文，即指以為夏徵舒，此猶有一字之近也。《碩鼠》一詩，茫無指實，而指以為《左傳》之魏壽餘，此孰見之而孰傳之。以《大田》為幽雅，《豐年》、《良耜》為幽頌，即屬之於公劉之世，此猶有先儒之舊說。以《草蟲》為《南陔》，以《菁菁者莪》為《由儀》，以《緝蠻》為《崇丘》，又孰傳之而孰受之。大惑不解，楷之謂乎！」

但何楷的學問博洽，後世諸家認為引用資料豐富。清初姚際恆在所著《詩經通論》卷前《詩經論旨》有如下的批評：

何氏書，刻于崇禎末年。刻成，旋遭變亂。（中略）大抵此書《詩》學固所必點，而亦時可備觀，以其能廣收博覽。凡涉古今《詩》說及他說之有關於《詩》者，靡不兼收並錄。復以經、傳、子、詩所引《詩》辭之不同者，句櫛字比，一一詳註于下。如此之類，故云可備觀爾。有志《詩》學者于此書不可惑之，又不可棄之也。然將來此書日就漸滅，世不可見。重刻亦須千金，恐無此好事者矣。

<sup>①</sup> 關於郝敬，請參照村山吉廣：〈「毛詩原解」序說〉，《詩經研究》第十二號（一九八七年二月）。

《四庫提要》作者的意見大抵相同，該書說：「楷學問博通，引援賅洽。凡名物訓詁，一一考證詳明，典據精確，實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。」

依《明史》卷二七六，何楷字玄子，漳洲鎮海衛人，天啓五年進士。曾任工科都給事中。他是個硬骨之士，起先和魏忠賢對立，仕福王朝時，曾上疏言事。從唐王時，與鄭芝龍、鴻逵兄弟相爭。辭歸時，遇山賊被削去一耳。姚際恒也說：「玄子官閩朝，爲鄭氏所害，印行無多，板亦燬矣。」<sup>②</sup>《明史》何氏傳末尾說：「楷博綜群書，寒暑勿輟，尤邃於經學。」總之，不但熱心於創造新見，而且做旁徵博引的考據。這可以說是何氏的特質。

顯示獨自見解的《子貢詩傳》和《申培詩說》二書也可以入這一類。兩書是豐坊僞撰。關於兩書的批評，姚際恒《古今僞書考》有如下一段：

二書，明豐坊僞撰（中略）。《子貢詩傳》，徒以孔子有「可與言《詩》」一語，遂附會爲此。其誕妄固不必言。若申培者，《漢志》有《魯故》、《魯說》。《隋志》云：「《魯詩》亡于西晉。」則亡佚久矣。坊之作此，名爲二書，實則相輔而行，彼此互證，若合一轍。中多暗襲朱氏《集傳》，以與《詩序》異者。又襲《詩序》爲朱之所不辨者。其他自創雖不無一二合理，然妄托古人以欺世，其罪大矣。

不用說，二書中的前者是子貢記述孔子的《詩》說，後者是漢文帝時博士申培已亡佚《詩》說的重新出世。書體也用篆、隸裝作時代很古。這樣做無非要引起世人的關心，各地也紛紛傳刻刊行。《總目提要》的《詩傳》（《子貢詩傳》）條述及，《詩傳》、《詩說》出現後，由郭子章、李維楨爲其「傳刻釋文」，何鏜的《漢魏叢書》、毛晉的《津逮祕書》均將二書收入，實在是謬妄之舉。

但是，關於這兩本書，夏傳才氏的《詩經研究史概要》（中州書畫社出版，一九八二年）中「僞詩傳及其影響」一節，却有如下相當積極的評價：

明代後期僞書成風，像僞《詩傳》這樣的僞托，當代學者崇信將近百年，不能辨識，正反映明人學問空虛淺薄，豐坊玩世不恭，僞托欺世，對於明人的

<sup>②</sup> 何楷《詩經世本古義》二十八卷，現在《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四集》所收，很方便。

空疏不學，是強烈的諷刺和否定。(中略) 偽《詩傳》產生在明代後期宋學定為官方統治思想的時候，朱熹《詩集傳》及其疏釋幾乎盤據了整個《詩經》傳習和研究領域。這兩本書，托名古人，突破漢、宋以來傳統《詩》說，表現出對《詩經》重新研究的要求，他對有些詩篇的具體見解，在明人的《詩經》研究史上不失為一家之言。

說是偽託、偽書，在豐坊的著述裏，果敢的向固定化、權威化的漢、宋《詩經》學作挑戰。按《明史》的傳(列傳第七十九豐熙的附傳)，豐坊「博學工文，兼通書法」，而「性狂誕」，別為《十三經訓詁》，「類多穿鑿語」。豐氏是秉持明末人特有奔放精神的自由人，有背離以前解釋的構想和創意，一路向前推進。<sup>③</sup>

其四，是古音研究的一派。陳第的《毛詩古音考》可作為代表。陳第，連江人，字季立，號一齋，萬曆諸生。官遊擊將軍。詩精巧，多藏書。《經義考》中載有焦竑〈序〉和陳第的〈自序〉。入清以後，顧炎武著《詩本音》，以作為清代古韻研究的奠基者受到重視。<sup>④</sup>

以上四派的著述，《明史·藝文志》《詩》類都有著錄，總數是八十七部九百八卷。但是，這些並不包括鍾惺等人所謂「竟陵派」的《詩經》著述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存目部分有《詩經圖史合考》、《毛詩解》二書，但給它們的評價很低。作為本論文討論重點的《詩經鍾評》，存目部分也沒有記錄。存目中，另列有章調鼎的《詩經備考》、錢天錫的《詩牖》、萬時華的《詩經偶箋》、賀貽孫的《詩觸》、戴君恩《讀風臆評》等竟陵派之流的《詩》解，態度很冷淡。

這點，是清代學界對這個學派作嚴厲批判的原因。在討論這派說《詩》在明代《詩經》學所佔的地位之前，先談談清代以來對這個學派批評的妥當性這一論題。

③ 關於《子貢詩傳》，有坂田新：〈「子貢詩傳」始末〉，《早稻田大學大學院研究科紀要別冊》四號(一九七八年三月)。

關於申培的《詩說》，可參照吳春山：〈申培詩說考〉，《孔孟月刊》十一卷三期(一九七二年十一月)。杜松柏：〈申培詩說辨偽〉，《孔孟學報》四十五期(一九八三年四月)。林慶彰：〈考辨「詩傳」和「詩說」〉，《清初的群經辨偽學》(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一九九〇年三月)，第五章。

④ 關於陳第業績的評價，賴惟勤：〈顧炎武的「詩本音」について(一)〉，《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紀要》二一卷三期(一九六八年三月)。其他，可參照康瑞珮：〈陳第及其「毛詩古音考」〉，《天津師大學報》一九八五年三期(一九八五年六月)。

## 竟陵派批判

竟陵是現在湖北省天門縣皂市鎮的地名。南齊時代，環繞武帝第二子竟陵王的八個文士，謝朓、任昉、沈約、陸倕、范雲、蕭琛、王融、蕭衍，總稱「竟陵八友」。竟陵在歷史上也因此而有名。以《茶經》知名的唐人陸羽，也在這裏出生，號竟陵子。明末從這裏出生的鍾惺、譚元春兩人，提倡與當時盛行的公安派相對的獨特詩論，推展旺盛的學術活動，竟陵派也因此得名。兩人的傳，附存於《明史》卷二八八·文苑四的公安派袁宏道、中道兄弟傳的後面。現在，列舉如左：

惺，字伯敬，竟陵人。萬曆三十八年進士。授行人，稍遷工部主事。尋改南京禮部，進郎中。擢福建提學僉事，以父憂歸，卒於家。惺貌寢，羸不勝衣。爲人嚴冷，不喜接俗客。由此得謝人事。官南都，僦秦淮水閣讀史，恒至丙夜。有所見即筆之，名曰《史懷》。晚逃於禪以卒。

自宏道矯王、李詩之弊，倡以清真，惺復矯其弊，變而爲幽深孤峭。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，爲《唐詩歸》，又評選隋以前詩爲《古詩歸》。鍾、譚之名滿天下，謂之竟陵體。然兩人學不甚富，其識解多僻，大爲通人所譏。元春字友夏，名輩後於惺，以《詩歸》故，與齊名。至天啓七年始舉鄉試第一。惺已前卒矣。

鍾惺號退谷。明萬曆二年（一五七四）生，天啓五年（一六二五）歿。享年五十二。譚元春初舉鄉試是鍾卒後二年的天啓七年。傳中「惺已前卒矣」，即指此事。鍾氏中進士是萬曆三十八年，他三十七歲的時候。最終的官位是天啓元年他四十八歲的福建提學僉事。從二十歲起多病，因此親近佛典。晚年精通《楞嚴經》，並爲其作注，有《楞嚴經如說》十卷。死前受五戒，法名斷殘。

生前的盟友譚元春，萬曆十四年生，比鍾惺小十二歲。相交於萬曆三十二年，鍾惺三十一歲、譚元春十九歲。兩人文壇上的聲望，決定於萬曆四十五年，鍾惺四十四歲時，刊行的《詩歸》。在這年，鍾氏也作《史懷》。譚元春短命，崇禎四年（一六三一）去世，年四十五歲。鍾惺的傳，在譚元春所作的〈退谷先生墓誌銘〉有相當詳細的記載。該墓誌銘收入譚元春的著作《譚友夏合集》卷十二中。

蘇州詩人徐波，在萬曆四十七年，因他的作品受到鍾惺的激賞，而成爲竟陵派中人，他在天啓末年刊行了《鍾伯敬先生遺稿》。此外，沈春澤刊行《隱秀軒集》，陸雲龍也出版《鍾伯敬先生合集》。

竟陵派抬頭，打擊公安派，並取代它。《明史·文苑傳四》中，袁中道傳之後，有如下的話：

至宏道，益矯以清新輕俊。學者多舍王、李而從之，目爲公安體。然戲謔嘲笑，間雜俚語，空疎者便之。其後，王、李風漸息，而鍾、譚之說大熾。

簡單地說，公安派主張捨棄李、王古文辭學派的形式主義，而主張「性靈」的發露，使他們變成恣意「戲謔」和「俚語」，而受到空疎的非難。指摘這弊端，主張「真詩」，鼓吹「幽深孤峭」的詩境的，是竟陵派。<sup>⑤</sup>但是，對於竟陵派的抬頭，在同時代的作家裏，也有持著《明史》所引的「兩人學不甚富，其識解多僻，大爲通人所譏」的看法的人。時值明清的交替期，入清以後，這樣的批評變得更加嚴厲。

第一位批評竟陵派的是錢謙益。他所著《列朝詩集小傳》的「鍾提學惺」條，有如下的敘述：

伯敬少負才藻，有聲公車間。擢第之後，思別出手眼，另立深幽孤峭之宗，以驅駕古人之上。而同里譚生元春，爲之應和，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，謂之鍾譚體。（中略）數年之後，所撰《古今詩歸》，盛行於世，承學之士，家置一編，奉之如尼丘之刪定。而寡陋無稽，錯繆疊出，稍知古學者咸能挾筴以攻其短。《詩歸》出而鍾、譚之底蘊畢露，溝澮之盈於是乎涸然無餘地矣。當其創獲之初，亦嘗覃思苦心，尋味古人之微言奧旨，少有一知半見，掠影希光，以求絕出於時俗。久之，見日益僻，膽日益粗。舉古人之高文大篇，鋪陳排比者，以爲繁蕪熟爛，胥欲掃而刊之，而惟其僻見之是師。其所謂深幽孤峭者，如木客之清吟，如幽獨君之冥語，如夢而入鼠穴，如幻而之鬼國。

⑤ 關於《詩歸》，有入矢義高：〈詩歸について〉，《東方學報》（京都）第十六冊（一九四八年十月）。關於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關係，可參照入矢義高：〈公安から竟陵へ——袁小修を中心として〉，《東方學報》（京都）第二十五冊（一九五四年十月）；高仁德：〈竟陵派の文學理論——公安派との差異點に重點をおいて——〉，《藝文研究》五六號（一九八九年一月）等。

浸淫三十餘年，風移俗易，滔滔不返。(中略) 鍾、譚之類，豈亦《五行志》所謂詩妖者乎。

前半段，說到鍾惺、譚元春的《詩歸》盛行於世，「家置一編，奉之如尼丘之刪定」的情形。後半段，述及兩人的淺學和充滿僻見的論斷，而把他們稱爲「詩妖」。

對他們的論難不亞於錢謙益的是顧炎武。他在所著《日知錄》卷十八的「鍾惺」條，有如下的論評：

鍾惺字伯敬，景陵人。萬曆庚戌進士。天啓初任福建提學副使，大通關節，丁父憂去職，尚挾姬妾，遊武夷山而後即路。巡撫南居益疏劾。有云百度踰閑，五經掃地，化子衿爲錢樹，桃李堪羞，登駟僮於臯比，門牆成市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。甚至承親諱而冶遊，疑爲病狂喪心。詎止文人無行。坐是沈廢于家，乃選歷代之詩，名曰《詩歸》，其書盛行於世。已而評《左傳》、評《史記》、評《毛詩》，好行小慧，自立新說。天下之士，靡然從之。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污之罪，且列之文人矣。余聞閩人言，學臣之鬻諸生，自伯敬始。當時之學臣，其于伯敬，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，奉爲利市之神，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，以爲風騷再作者耶。其罪雖不及李贄，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。(下略)

顧炎武的論點有二：一是私行上的問題；另一是「好行小慧，自立新說」。顧氏的書在這條之前有「李贄」一條，對李贄作糾彈，說李贄「挾妓女白晝同浴，勾引士人妻女，入庵講法，至有攜衾枕而宿者，一境如狂」。現在，要弄清其中的真相是不可能的，但這兩者都一起說到明末風氣中有著放縱的倫理觀。還有，說到鍾惺「大通關節」、「學臣之鬻諸生」等，爲官不正的事。但事實關係姑且不論，或許有讓人家持那種看法的背景吧！

但是，他們的事情和鍾惺學術上的立場和主張的是非，很自然地，非從別的地方來思考不行。顧炎武上述的話，感情太激越，有失公平的判斷。

先前所舉錢謙益曾對鍾惺作無謂的「人身攻擊」。此點張國光氏的〈論竟陵派詩歌理論的進步意義兼評錢謙益的誤說〉（竟陵派文學研究會編：《竟陵派與晚明文學革新思潮》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七年五月）一文已有論及。以下舉其中的一節：



錢氏爲了要雄長清初詩壇，當然要反對前、後七子的詩必漢、魏、盛唐的復古主義。但如果僅反對前、後七子，那就談不上有什麼建樹。因爲公安派與竟陵派早已完成了反對前、後七子的歷史使命，爲此錢氏對這兩派就也要痛下針砭，乃至肆意貶斥。如果說由於錢氏同公安三袁私交頗深，因而有時不得不在表面上對他們有所褒揚的話，那麼他更要把代公安派而起，並且事實上已主宰詩壇三十年的竟陵派，當作自己稱霸詩壇的最大障礙，因而就放肆地加以攻擊了。（中略）斥之爲鬼趣，誣之爲詩妖，錢氏對竟陵派的敵視竟到了此極端的程度！這哪裏是文學批評？實際上是對竟陵派的人身攻擊。（下略）

張氏想說的是，錢謙益對鍾惺的批評，是由於他那詩壇霸者的企圖心，再加以擴大所形成的極端之言。

《明史》的傳，錢謙益、顧炎武等，所說的「學不甚富」、「寡陋無稽」、「好行小慧」的批評，和「不學」的定評，也有必要一考。

關於這點，近人郭紹虞氏所著的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（商務印書館刊），爲鍾惺作了辯護。茲引用如次：

人家說，鍾、譚不學，而他們則正欲以學救其弊。鍾氏〈與友夏書〉云：「輕詆今人詩，不若細看古人詩，細看古人詩，便不暇詆今人也。」（《隱秀軒文·往集·書牘一》）他們何曾號呼叫囂，心粗膽橫。如牧齋之所言者。鍾氏〈孫曇生詩序〉云：「人之爲詩，所入不同，而其所成亦異。從名入、才入、興入者，心躁而氣浮；……從學入者，心平而氣實。」（《隱秀軒文·尺集·序又二》）蓋從名入、才入、興入者，則欲其心之由躁而平，氣之由浮而實，必待年而定。年愈高，學愈進，則詩之所成也隨以異。從學入者便不須如此。可知鍾氏論詩，正以從學入者爲高，是則竟陵派之詩論，又何嘗廢學！（下卷，第三篇明代，第三節竟陵派）

這樣看來，清代對於鍾惺一派的批判，並不一定恰當。因此，他在明代《詩經》學

上的位置，這樣的批判並不容易讓人接受，從新的觀點來評判是可以考慮的。<sup>⑥</sup>

## 訓詁和評經

鍾惺學《詩歸》的方式來圈批和評騭《左傳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史記》，前舉顧炎武的《日知錄》已有指摘。關於其中的《左傳》，現在我所見過的是內閣文庫所藏的《左傳合註詳解》一冊本（二卷）。鍾惺點評，古吳杜麟徵振公、王道焜昭平訂正。崇禎十二年序刊，近聖居藏版。

關於《詩經》的著述，鍾惺所著的〈詩論〉一文有如下的記述<sup>⑦</sup>：

予家世受《詩》，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。意有所得，間拈數語。大抵依考亭所注，稍爲之導其滯，醒其癡，補其疎，省其累，奧其膚，徑其迂。業已刻之吳興。

把這個和《日知錄》的記述相對照來看，在這裏，應該去考究的書有兩種：一種是《鍾伯敬先生評點詩經》。這書沒有序，二冊本，來因堂藏版。另一種是題《詩經鍾評》的三冊本。明泰昌元年刊，有杞堂藏版。這二書由內閣文庫所藏本可以得到確認。<sup>⑧</sup>

另外，前述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存目部分所記的《詩經圖史合考》、《毛詩解》二書的書名，根據《提要》的文章，這兩書很明顯地，與談及〈詩論〉的書物並不相符合。又《毛詩解》有內閣文庫藏本，可看出其內容。

現在，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》曾採入作為鍾惺著作的《詩經評》不分卷，明閔氏刊朱墨印本。該文引述如次：

⑥ 一九八〇年代，在中國，顯示對竟陵派評價的徵兆。那是從這個派的「改革」和「創新」的精神，去看出它的價值。在鍾惺、譚元春出生地的湖北省，於一九八四年八月，成立「竟陵派文學研究會」。不久，開了第一回學術討論會。討論會的成果，於同年十二月，由主編張國光、副主編張業茂編成《竟陵派與晚明文學革新思潮》（武漢大學出版社），收〈應公正地評價竟陵派對文學史的貢獻〉（焦知雲）以下三十多篇論文。

⑦ 李先耕、崔重慶標校：《隱秀軒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九月）卷二二所收。另有加藤實氏：《詩論譯注》，《詩經研究》第六號（一九八一年六月）。

⑧ 關於內閣文庫所藏《詩經鍾評》，村山吉廣有〈鍾伯敬「詩經鍾評」の周邊〉，《詩經研究》（同上）。

明鍾惺評點。是書廢棄一切傳箋註，止就三百篇正文，略拈數語，或著行間，或列欄上，或括題下。語簡而彌雋永。大抵本其所撰《詩歸》之旨。亦說《詩》者別一法門也。（下略）

從形式和內容的共通性判斷的話，這裏所說的《詩經評》，和內閣文庫所藏二書中的《詩經鍾評》比較接近（但《詩經鍾評》不是朱墨印本）。總之，鍾惺學《詩歸》的方式，在經典中的《詩經》加上圈選，呈獻給世人，使後世議論不斷。前引的《日知錄》鍾惺條原注，顧炎武對鍾惺有如下的批評：

錢氏謂古人之于經傳，敬之如神明，尊之如師保。誰敢僭而加之評隲。評隲之多，自近代始，而莫甚于越之孫氏、楚之鍾氏。（下略）

這裏所說的「越之孫氏」，不用說也知是孫鑛，即孫月峰。「孫月峰評經」是很著名的。

另外，《日知錄》說的「評隲」，是對本文所作的簡短的評語。廣義來說，那是對本文所作的圈點、批點的意思。但是，圈評的方法，決非孫鑛和鍾惺所創始。近人尤信雄氏《桐城文派學述》（文津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四年四月）第四章第二節「評點之學」，關於這事有很詳細的介紹。<sup>⑨</sup>尤氏還引述了曾滌生〈經史百家簡編序〉一文如次：

前明以《四書》經藝取士，我朝因之。科場有勾股點句之例，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。試官評定甲乙，用硃墨旌別其旁，名曰圈點。後人不察，輒仿其法，以塗抹古書，大圈密點，狼藉行間。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，而今專以施之時文。圈點者科場之陋習也，而今反以施之古書。末流之變遷，何可勝道。

用朱墨圈點的例子，從唐劉蛻的《文泉子集》卷三〈文家銘〉開始，宋呂祖謙的《古文關鍵》也將唐、宋文六十餘篇施予圈點，謝枋得的《文章軌範》有批注圈點，人所皆知。但是，一到明代，會試的主考官在寫有答案的優秀文卷上施加圈評，也變

<sup>⑨</sup> 關於桐城派的圈點，有武內義雄博士的〈桐城派の圈識法〉，《支那學》第八號（大正十年六月）。

成很平常的事。這點也影響到出版界，民間的書店在刻《四書》時，會在上面加上圈評。曾滌生所說的「科場之陋習」就是指這件事。

但是，書店除加圈評在《四書》上外，像孫鑛和鍾惺活躍的明末間，膽敢在《左傳》和《詩經》那樣的五經經典加圈評的學者是極為稀少的。因此，他們的作法，也引起堅持「古之于經傳，敬之如神明，尊之如師保，誰敢僭而加之評隲」的立場的顧炎武的反感。<sup>⑩</sup>

那麼，鍾惺所持的《詩經》觀如何呢？這點，可從檢討他的〈詩論〉得知。〈詩論〉開頭有如下的話：

《詩》，活物也。游、夏以後，自漢至宋，無不說《詩》者。不必皆有當於《詩》，而皆可以說《詩》。其皆可以說《詩》者，即在不必皆有當於《詩》之中。非說《詩》者之能如是，而《詩》之為物，不能不如是也。

《詩》的注釋，時代不同，解釋的人也不同。從歷史來看，所見到的也不一定妥當。但是，那並不是說《詩》者的罪過，而是《詩》本身是「活物」的特性所造成的。此事將於以下再加說明。

說《詩》者盈天下，達於後世，屢違數變。而《詩》不知，而《詩》固已明矣，而《詩》固已行矣。然而《詩》之為《詩》自如也。此《詩》之所以為經也。

說《詩》者作出和時代共同變化的注解，那是說《詩》者的問題，詩本身並未受任何影響。「《詩》之為《詩》自如也」，就是那個意思。因為具有這樣的特質，《詩》才能叫做「經」。

那麼，說《詩》者的注解有何意義呢？〈詩論〉有如下的說法：

古之制禮者，從極不肖立想，而賢者聽之。解經者，從極愚立想，而明者聽之。今以其立想之處，遂認為究極之地，可乎？

<sup>⑩</sup> 清代中期，桐城派盛行，對經傳的評點也變得相當自由，姚姬傳的《評點左傳》、《評點禮記》、《評點易經》等也被刊行。還有，清末吳汝綸有《評點詩經》、《評點書經》。

總之，那樣的注解並不是究極之物，爲了幫助讀《詩》的人，作爲理解的起點來考慮，倒不如置於讀《詩》人之側，自由去接受。

還有，即使同一人的注解，從同一首詩中，引出的感情通常也是不一定的，情趣時時刻刻都在變化中，所謂「趣以境生，情由日徙」。從《詩》中求固定訓詁，是不可能的。這有如下的記述：

欲使宋之不異於漢，漢之不異於游、夏，游、夏之說《詩》，不異於作《詩》者，不幾於刻舟而守株乎？

把注解從古到今定於一的說法，可說類似於「刻舟守株」的謬見。在該文裏，他作了如下的結論：

故說《詩》者散爲萬，而《詩》之體自一，執其一，而《詩》之用且萬。噫，此《詩》之所以爲經也。

還有，在這裏，作爲鍾惺的問題的「詩」，是作爲主導的《詩經》的詩，但在他的意識裏，《詩經》的詩和古詩、唐宋詩，並沒有什麼區別。選錄古詩、唐詩的《詩歸》的〈序〉，有如下的說法：

選古人詩而命曰《詩歸》，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，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。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，使其心目有所止焉，如是而已矣。

「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」這種說法，是反對自己的見解成爲固定化、權威化。

鍾惺從《詩經》開始解說歷代詩的時候，堅持去探求詩中寄託的古人，乃至作者之心的所在——這叫真詩。但是，把握真詩因時因人而有限制，是必須考慮的。<sup>①</sup>這是從《詩》的本質產生的，對讀者來說，可以說是一種無可逃避的命運。因此，

① 關於「真詩」的解釋，入矢義高氏有如下的說明：「談到詩文古今不動的規格的存在，宏道並不贊成。他所信奉的唯一東西，是自己胸臆中的『性靈』。鍾氏把那叫『精神』。(中略)所謂『真詩』的觀念，實脫胎於袁宏道，由鍾氏把它表現出來。」(前掲〈詩歸について〉)。

注解可以說僅止於個人而已。用一種方法了解作《詩》者的心，而給後人扮演參考的角色已足夠。

因此，他認為歷代的訓詁注釋，不論那一家都不是絕對的權威。它們全部有它的限界和制約。<sup>⑫</sup>現在，看看《詩經鍾評》，鍾惺在《詩》的本文（正文）任意施加批點和圈點。句中或欄上，任意加上叫「評語」的感想，乃至記下批評。這種奔放的作法，有時被認為是「淺陋」、「不學」。但是他們並不在乎。

他們否認傳注的權威，排斥歷代的訓詁，重視以直感、直覺作論斷。他所尊重的是自己的「感性」。他以自己一人的感性提出圈評這種形式，以提供給讀者。他用這種批評方式，引導讀者作為「欣賞」作品的媒介。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全部的使命觀。<sup>⑬</sup>

這是屬於明代說《詩》流派中的第三派「大膽主張自己的說法，以獨特的見解向世人宣示」。其中極為不同的是叫「評經」的新立場。這竟陵派的《詩》說，不久由同時代的章調鼎、錢天錫、萬時華、賀貽孫<sup>⑭</sup>、戴君恩<sup>⑮</sup>等人所繼承，至清代，則有姚際恒、崔述、方玉潤等解《詩》者的出現。<sup>⑯</sup>有關他們，將另有論文詳述。總之，鍾惺的《詩經》學促進近代《詩經》的「欣賞」，也對所謂「文學鑑賞派」的成立有很大的貢獻。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。

——原載《東洋の思想と宗教》第十號（平成五年六月），頁一～一四。

〔附記〕本文翻譯過程中，曾得東吳大學中研所日籍研究生大藪久枝小姐指正部分缺失，並蒙本所蔣秋華、楊晉龍兩先生提供意見，謹誌謝忱。

<sup>⑫</sup> 在文學史上，從時代先後來建立評價基準的是，所謂李、王的古文辭學派的立場，公安派、竟陵派則排擊這觀點。在這裏，這種研究也適用於《詩經》的解釋。

<sup>⑬</sup> 在《詩歸》的序，鍾惺的盟友譚元春表明了如下的立場：「法不前定，以筆所至為法；趣不強括，以詣所安為趣；詞不準古，以情所迫為詞；才不由天，以念所冥為才。恬一時之聲臭，以動古今之波瀾。」

<sup>⑭</sup> 關於賀貽孫，有嶋崎一郎氏的〈周作人「賀貽孫論詩」翻譯〉，《詩經研究》第十七號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）。

<sup>⑮</sup> 關於戴君恩，可參照村山吉廣：〈崔述「讀風偶識」の一断面——戴君恩の「讀風臆評」とのかかわりについて——〉，《中國哲學》（北海道中國哲學會）第二十一號（一九九二年十月）。

<sup>⑯</sup> 關於方玉潤，有村山吉廣：〈方玉潤の詩經學〉，《日本中國學會報》第四一集（一九八九年十月）。